

中國人民銀行經濟叢書

蘇聯經濟核算制度

查清柯著

吳清友譯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印行

中國人民銀行經濟叢書

編者序

中國革命基本上已完成了全國的勝利，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即將成為中國人民第一等迫切的歷史任務。

但如世所週知，中國人民的生產力，實在太低弱了。中國迄今仍是一個非常落後的農業國。就經濟成份來說，革命勝利以後，雖然出現了從官僚資產階級手上接收過來的社會主義性的國營經濟，但是資本主義的和小商品生產的私營經濟，依然佔着數量上的優勢。因此，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首要的中心任務，是要在社會主義性的國營經濟的領導和積極影響之下，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逐漸轉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

要儘速完成這樣一種艱鉅偉大的任務，主要的當然要根據自力更生的原則，來最大限度地動員全國人民的能力與資源到生產事業上去。但是學習社會主義蘇聯和中東南歐新民主各國的建設經驗，也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偉大社會主義蘇聯的異常豐富的建設經驗——它如何在百孔千瘡的經濟條件之下克服各種嚴重的困難，如何在困難重重的條件之下戰勝階級敵人的搗亂，如何把一個殘破不堪的農業國家，建設成

一個輝煌繁榮的先進工業國家，又如何把一個小私有經濟佔相當大的比重的國家，改造成為一個生產高度集中的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等等。這一切豐富的經驗，對於一個年輕的人民的中國是非常寶貴的，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學習，特別值得每一個直接參加經濟工作的同志細心學習。嚴肅而認真地學習偉大友邦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各國社會主義建設各部門的經驗，是新中國建設迅速成功的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

本行編譯這套經濟叢書，唯一目的就在介紹友邦這種寶貴的經驗，給我們的經濟工作者以學習上和實際工作上的一些幫助。學習了這種經驗，我們在新民主主義的經建過程中，就可把友邦的成功經驗充分地吸取過來，以加速我們的建設，同時也可把他們碰了釘子的失敗經驗或因暗中摸索而走過的冤枉路，盡量予以避免，使我們的建設能夠更順利些，效率更高些。

這套叢書將盡可能包括蘇聯（或新民主各國）經濟建設的一切部門，和從實踐到理論的一切問題。這裡有財政、金融、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國內外貿易、合作事業、計劃經濟、勞動組織生產管理、報酬制度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理論問題等。一律以翻譯為主。

以每冊叢書的量和質說來。我們只問這書本對於我們的經建工作或經濟研究工作有無參考與研究的價值，却不問它是通俗的小冊子，抑是專門的學術著作。凡是值得我們學習，或有研究價值，能夠幫助我們從事經建工作的，不論它是薄薄的通俗小冊

子，或是厚厚的學術專著，我們一律要盡力之所及，把它列入本叢書之內。

不過翻譯雖說是「述而不作」，却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們認為譯文的第一要旨是忠實正確，不許臆測，想像或杜撰。同時我們却也反對絕對的「直譯」，因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歷史的條件和不同的生活習慣，傳達人們情意的語言文字，在用語上，字眼上以及句法辭法上，都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事實上不同而偏要用「直譯」的方法強令其同，自然要變成誰也看不懂的「漢字的洋文」了。因此，前面所說的忠實正確，主要的是指對原著原意的忠實正確，却不是對原文中每一個字每一個用語的絕對直譯。我們的原則是可以直譯的地方當然應當直譯，沒法直譯的地方（直譯起來令人看不懂的地方），即應當用意譯，但這不是臆測的「意譯」，而是忠實的意譯。

自然，這套叢書的譯文，我們不敢相信已經做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我們雖然努力這樣做，但事實上不正確、不妥當、或甚至錯誤的地方，仍是在所難免的。我們這裡謹以至誠，祈專家和讀者們的指教，以便於每書再版時，予以修正。

目 錄

第一章 新經濟政策與財政金融政策之任務……………一

一 以糧食稅代替糧食徵發制・商品交換的組織……………一

二 從商品直接交換轉到自由買賣……………四

三 轉到新經濟政策後財政金融政策的任務……………九

四 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貨幣流通……………一七

第二章 企業轉到經濟核算制・爭取轉國家支出的減縮與非捐稅

收入的增加……………二六

一 企業轉到經濟核算制……………二六

二 經濟核算制的發展・關於托拉斯的指令……………三〇

三 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把經濟核算制作爲有計劃地領導社會主義企

業的方法……………三七

四 擲節國家的支出・組織財政金融的監督……………四一

五 非賦稅收入的增長……………四八

第一章 新經濟政策與財政金融政策之任務

一、以糧食稅代替糧食徵發制・商品交換的組織

英勇的紅軍，在黨和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擊潰了外國干涉軍與國內白衛軍之後，就造成了轉到恢復國民經濟和平建設工作之可能。

軍事共產主義政策，是由國內戰爭及外國干涉諸條件所逼成的。此種政策是在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階級在軍事、政治聯盟的基礎上來推行的。向恢復國民經濟和平工作之轉移，需要求應用經濟建設的各種新方法，保證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階級的經濟結合。為要解決經濟建設的任務，必須建立經濟關係的新體系，此種體系在社會主義經濟構成的作用和意義之增加與鞏固的必要條件下，會刺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此種關係大體上也意味着向一九一八年初列寧所指出的那種經濟及財政政策之回復，可是同時也顧到與勞動農民聯盟的工人階級在內戰歲月裡所實現的一切根本變化及勝利。一九二一年蘇維埃國家轉移到新經濟政策上去了。

經濟政策諸問題的新方針，於一九二〇年末及一九二一年初在職工會問題爭論時，在列寧及斯大林領導之下，由黨制定了。

黨是從下面這一事實出發：社會主義工業的復興和發展，要求農民經濟迅速的恢復，農民經濟是糧食和工業原料的供應者，同時又是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列寧曾經指出，在前一時期曾經起過巨大肯定作用的糧食徵發制，已與和平建設條件下城鄉間正確經濟關係之確立的任務不相符合。必須把千百萬農民大眾的主動性提高起來，轉移到城鄉間的商業結合，只有此種結合，才能保證社會

主義往前建設。必須以糧食稅代替糧食徵發制，使農民可能按照自己的願望並為根據自己的經濟來利用對國家履行納稅義務之後所剩下的自己產品的巨大部分。

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的報告而通過以糧食稅代替糧食徵發制的議決案，奠定了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基礎。在議決案中指出：

「爲了在讓農作者們更自由地處理其經濟資源的基礎上、正確和安定地經營生產，爲了鞏固農民經濟並提高其生產率，以及爲了精確地規定農作者們所應負擔的國家義務，作爲國家採購糧食、原料及飼料之手段的徵發制，以實物稅制代替之。

二、此種稅率應當少於迄今爲止用徵發制所課征的稅率。此種稅收總額，應以能夠滿足軍隊、都市工人及非農業居民最低限度需要爲計算標準。隨着運輸及工業之恢復，使蘇維埃政權在可用正常方法，即是經由工廠的及手工的製成品之交換而獲得農產品時，此項稅收總額應當以經常的減少。」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按即蘇俄中央政府——譯者）發出以實物稅制代替徵發制的指令。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按即最高行政機關——譯者）接着下令規定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度糧食稅的數額爲二億四千萬普特的穀物及飼料，而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度農民按照徵發制應繳的則爲四億二千三百萬普特。

按照預先規定期限即須繳納的實物稅代替了徵發制之後，刺激了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的個人興趣，因爲留在農民手裡的多餘農產物，賦予自由處理之權，用以擴充自己的經濟，增加個人的消費並交換爲工業品。

與實物稅的實行相關聯，在國營及合作社經濟組織前面提出一個任務，即是透過自己的機構，依據自願的原則，以農產品交換國營工業的出品，這一任務是以農民階級經濟利益做出發點的。因此，在國家領導及監督之下，在某種限度內，要求容許貿易的自由。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蘇維埃人民委員會「關於交換」的指令，准許公民及合作社組合進行自由交換——在繳納實物稅之後，進行農產品的自由買賣以及手工製品和小型工業品的自由買賣。至於國營企業의 出品，應當不是進入市場，而是作為國家的商品交換基金，此種基金是受糧食人民委員會的管轄，並依據糧食人民委員會與聯邦消費合作社中央總社之間所簽訂的合同，主要是通過合作社的組織被指定作為交換之用（在個別の場合，也依據委託的原則，透過私人而進行交換）。

應用物品直接交換的必要性，是由許多情況所引起的。首先是自由貿易限於地方流通的範圍，自由貿易限於國家與農民經濟間物品直接交換的組織，這些限制的用意，原是預期阻礙私人資本的發展，不讓它在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民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中起着媒介的作用。同時物品的直接交換，也受國家商品基金之不足所制約的。應當最有效地利用國家商品基金，使在交換中能够獲得正是國家所需的那些產品。有些消息說明，農民對工業品感到迫切的需要，認為最好把自己的農產品交換為工業品，而不是交換為貶值了的貨幣，同時也預期交換將可阻止農產品價格投機性的暴漲。根據一九二一年九月八日「糧食報」的消息：「在四—五月前，農民到處抵制貨幣，要求只以特定的物質價值交換農產品」。

除此以外也應當指出，國營企業及機關缺乏做買賣的習慣，它們在內戰年份內不是從事商品的貿易，而是分配商品。

由於一九二一年春季及夏季全國糧食狀況的嚴重，物品直接交換的組織與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如黨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在指令中對刊物所作的解釋，糧食狀況的惡化，是由于糧食倉庫中的穀物被反革命匪徒所竊奪的結果，在西伯利亞各省份以及若干其他地區的運輸及糧食機構被他們破壞了，許多省份種子物資的過份消耗，以及由於必須增加對生產省份的工人的供給，致使消費區域缺乏食糧。

糧食狀況的嚴重，由徵發制向實物稅制的轉移而加深，因為按照實物稅制，只在夏末秋初才能收到食糧。為要維持到秋季以前，需要組織商品的交換。

在上面業已提到的政治局指令中指出：「……過去在饑荒的日子裡，蘇維埃政權號召勞動者組織糧食隊並爭取穀物，現在蘇維埃政權號召他們幫助國家，為着大家組織對農村的交換，同時也為着自己的工廠或製造廠組織對農產品的交換」。

二、從商品直接交換轉到自由買賣

商品直接交換只能當作走向開展貿易及自由買賣的過渡辦法。在實行商品直接交換的初期，就已發現它有力地排擠國營及合作社商品流轉之開展，它不是收購農產品的最有效方法，而且還助長了投機。

事情在於自由交換（起初只容許在地方商品流轉的範圍內）歸結到私人貿易的發展。在取得自由處理自己多餘產品的權利之後，農民或者用它去交換按照商品交換程序由合作社組織所提供的工

業品，或者拿到市場上去出賣而取得現金。如果工業品的供應只以國家所劃出的、並透過合作社加以有組織的變賣之商品交換基金為限，那末對農產品按現金出賣，將不會有什麼刺激。可是事情遠不是這個樣。新經濟政策喚起私人及手藝工業生產之活躍，這些產品進入用現金交換的市場。除它以外，國營企業所出產的工業品也滲入市場。根據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蘇維埃人民委員會關於實物獎勵基金的指令，此種獎品是由企業從它自己所產的出品中劃分出來，同時生產品不宜於與農民交換的企業，有權在個別工場，在空閒的車床上，在非限定的期間內對基本生產沒有損失的情形下，為着此種目的劃出一羣特別的工人以製造宜於此種交換的物品。此種基金被指定作只透過工人合作社的商品交換，工人只在個人消費的範圍內，才能把自己生產的成品拿到手裡。可是，工人所得的製成品，大部分被拋到市場上去，這就增加了市場上工業品的供應。結果農民得到了選擇的可能：或者把自己多餘的產品在合作社中交換為工業品，或者把它拿到市場上去變賣為現金，而就在那裡取得工業品。透過合作的有組織的商品交換，應當進而與私人市場，與買賣作鬥爭。在此種鬥爭中，優勢是在自由買賣方面。

商品的直接交換，只發生於交換的參加者相互需要彼此的物品的那種場合。合作社組織為要鼓勵農民將其產品交換為合作社所供應的商品，它就應具備農民——農產品的持有者所需要的那種商品。在此種情形下，工業品的質地、種類及數量都具意義。合作社所供應的商品，按其品質來說，不應當差於市場上所有的商品。同時農民應當從合作社所供應的各種工業品得到滿足，他有可能在合作社中得到與自己需要相符合的各種商品。但合作社中的商品種類是非常有限，農民往往認為更好是把自己的產品在市場上出賣，而就在那里購入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此外也須顧到別種非常重要的情況。在私人市場上，價格是依繫於供求關係而形成。此種價格成爲市場交換的基礎，它與工業品是否直接交換爲農產物，或者彼此都變賣爲現金是沒有關係的。透過合作社的有組織的商品交換，即是各種商品之交換，應當在經濟上創立的實物等價基礎上來實行。

爲着確定此種等價，曾經設立特種等價委員會：中央的及地方的（省份的）。根據地方統計資料，在中央編製的價目表，對糧食人民委員會來說，應當成爲規定各省份之平均等價時的基礎。應當賦予地方委員會更動個別等價之權利，但要計算到對每一省份各種商品交換的總數，應當與對每一省份所規定的平均等價相符合。

在每一經濟區域規定交換的等價時，應當採用某一種農產品作爲基礎。例如在穀物區域，穀物（小麥或黍）是編製等價表的基礎。在此種情況下，地方委員會應當顧到市場的價格。可是由於市場價格的極大變動，在這些價格與交換的等價之間是不相符合的。下列一種情況發生更大的反面影響，這就是等價表沒有顧到同一類商品內部品質的差別是否完全計及。在這種基礎上就發生濫用職權，投機式地轉買商品及產物。

商品直接交換的缺點，在它實施的最初幾個月就已被發現出來。作爲確立國營工業與農民經濟間直接聯繫之嘗試，有組織的商品直接交換應當阻碍私人資本的發展。實際的情形指明了經濟的優勢是在自由買賣方面。

一九二一年八月，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指出，「凡有此種可能及有利的地方，必須轉到貨幣形式的交換」。一九二一年十月二日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曾經確定「由國家機關移交給消費合作社機關的

商品基金，無論是作為固定的或委託的，由合作社的相當機關加以完全處理，可以按照它們的願望而變賣（按現金出賣，直接的或綜合的商品交換）。『在簽訂合同時，規定商品的等價以及商品和農產品的價格，應按照適合於相當區域的市場平均價格。』依據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勞動與國防委員會議決案，把被指定作為直接交換之用的商品基金進行計算，指明了交換已變為自由買賣了。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列寧在第七屆莫斯科省黨的臨時代表會議上就已強調指出轉移到自由買賣之必要：

「假定在全國工業品對農業品的交換多少是社會主義式的，且以此種物品交換作為恢復社會主義組織唯一基礎的大工業。那末結果怎樣呢？現在你們從實際上都知道這一切，而且從我們的報章上也看到這一切，結果是物品的交換被破壞了：破壞是在這種意義上說，即是物品交換溶化為自由買賣了……物品交換得不到什麼結果，私人市場比我們更強有力，通常的買賣——貿易，代替了商品直接交換。

你們硬着頭皮去適應它吧。否則買賣的自發勢力，貨幣流通的自發勢力要鞭打你們！」。

依照列寧的指示，黨從商品直接交換轉到自由貿易及貨幣流通的國家調節。國營企業所製的商品及人民所作的勞務，由國家規定貨幣的報酬，設立價格委員會，以貨幣形式的工資，代替實物的供給，實行把企業轉到經濟核算制上去。賦予國營企業以買者及賣者的資格進入市場的權利，相應地改組工業管理，並重建它與預算制度的相互關係。不顧列寧的指示，合作社向自由買賣的轉移進行得非常遲緩，雖然合作社的領導者們自己明顯地看到了商品直接交換的失敗。

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月的新聞類編中報導說：「從地方來的消息，證明實物形式的交換，到處而且很快地開始被貨幣形式的交換所排擠。還在一年以前，農民及商品生產者們一般地都不願意把產品換成金錢，而需要日用品（鹽、布疋等等），可是在過去的四個月中，情形改變得很厲害。凡有商品的人，都把它出賣，照例願意把它換成貨幣（現金）。只在遠離鐵道及工商業中心的那些區域裡，商品交換的實物形式才佔有優勢的意義。不久以前，那樣流行和用途甚多的貨幣單位——鹽，它的作用在這裡幾乎已成爲過去了。」

向自由買賣轉移延宕，一部份是由週轉金（錢幣）的缺乏所決定的。但主要原因是在於合作社領導者們的不善於運用。「農村需要貨幣，而在合作社方面則有作爲交換之用的商品基金。把經濟的產品運到城市去嗎？但這在我們的範圍內往往是不可能的事物。」

應當指出商品直接交換的組織，不僅沒有排斥對貨幣流通的關心，而相反地是把它看作替貨幣流通創立鞏固基礎之一途徑。透過商品直接交換及糧食稅，原是預期創立國家的糧食基金，作爲整理蘇維埃國家貨幣流通及鞏固整個財政制度的第一步。

在農村經濟中小商品經濟構成佔優勢的條件下，自由貿易難免產生資本主義的成分。可是列寧指出，蘇維埃國家並不怕私人資本。基本的經濟力量操在我們手裡。一切決定性的企業，鐵道等等全都操在我們手裡……經濟的力量是操在俄羅斯無產階級國家的手裡，完全足夠保證向共產主義的轉移」。但爲要在與資本主義成分作鬥爭中達到勝利，必須掌握經濟活動及經濟領導的新手段與新方法。

列寧在莫斯科省黨第七次臨時代表會議上曾經說過：「我們應當明瞭目前的具體條件，要求國

家調整貿易及貨幣流通。而且正是就在這一領域內，我們自己應當有新表現』。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黨的第十一次臨時代表會議指出：『目前在經濟領域內的基本任務，是領導蘇維埃政權的經濟工作，其方向是從現有的市場出發，注意到市場的法則，掌握這些法則，並用有系統的，經過深思熟慮的，以及建立在精確估計市場過程的經濟措施，把市場及貨幣流通的調節抓到自己的手裡』。

列寧所提出的『誰戰勝誰』這一問題之解決，有賴於此。這就是說，或者資本家確立並鞏固與農民的商業聯繫，在其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利用農民；或者國營的及合作社的企業與組織善於搞好城鄉之間正確商品流轉，並盡量發展它，使蘇維埃政權有可能加強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新經濟政策的本質，由斯大林同志在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新經濟政策所下的定義中，天才地表達出來：

『新經濟政策乃是無產階級國家的特殊政策，其目的是要在無產階級國家握有經濟領導權的條件下，容許資本主義成分的存在，資本主義成分與社會主義成分進行鬥爭，抑制資本主義成分以提高社會主義成分，從而使社會主義成分戰勝資本主義成分，消滅階級，奠定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

三、轉到新經濟政策後財政金融政策的任務

在重建經濟關係中，在加強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作用中，在實行列寧——斯大林的合作計劃中，在鞏固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的聯盟中，蘇維埃的財政金融有着最大的作用。在致一九二二年全俄財政會議的賀簡中，列寧指出：

「鞏固蘇維埃財政金融的任務，是最困難的任務之一，但現時它擺在前列，不解決這一任務，無論在抵禦國防資本以保衛蘇俄獨立的事業上，或者在發展全國經濟和文化的事業上，都不能往前跨一大步。」

加里寧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致賀詞時說：「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那裡勞動散漫到難以令人置信的程度，除了財政金融機關之外，我沒有看到別的機關能够把此種勞動最微細的單位集合起來，把它們變為緊密的，並在這種勞動之上建立共產主義的再生產」。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加里寧在「蘇維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諸問題」一文中寫道：「可以假定，代表大會對財政金融問題，將加以巨大的注意，這些問題在目前具有越來越大的意義。還難想像到代表大會對這些問題的工作將得到什麼結果，但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這就是財政金融的領導機關將從貨幣的簡單分配者變成具有偉大政治意義的機關」。

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曾經指出，與新經濟政策相配合，蘇維埃國家的財政金融政策有改變之必要。全國代表大會委託黨的中央委員會：「在基本上重新審查我們整個財政金融政策及稅收制度，並在蘇維埃的程序上進行必要的改革」。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論財政金融政策的議決案中也曾指出重建蘇維埃財政金融並利用它以建設社會主義領域內的措施之詳細綱領。

鞏固蘇維埃通貨是財政金融政策的中心任務。列寧在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曾經指出：「……貨幣流通，這是可以很好地檢查全國流通滿意程度的事物，當此種流通是不正確的時候，從貨幣中所得到的將是無用的紙片」。

同時如像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由於經濟關係的自然化（即是實行實物的直接交換與分配——

譯者），貨幣的作用激劇地減少了，現時在轉到新經濟政策之後，貨幣的作用大大地增長了。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論財政金融政策的議決案中指出：『在新條件下，國家行政所需要的，也如國營生產所需要的一樣，蘇維埃國家只獲得局部的保證，而且是用實物直接供給（或者物質價值的直接移動）的形式，在愈益萎縮的規模中來進行，越來越多地透過市場的媒介，即是透過貨幣的媒介來進行』。

只在消滅實物關係的基礎上，才能保證城鄉商品結合的發展與鞏固，在新經濟政策道路上，把整個經濟鞏固起來。但爲要完全消滅實物的關係，需要透過貨幣的媒介，透過貨幣流通的機構，對國營工業，軍隊及機關予以可靠和穩定的供給保證。價格的穩定，貨幣貶值的停止，是此種保證的前提。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斯大林寫道：『不把貨幣流通搞上軌道並改善盧布的市價，那末我們的經濟工作無論是國內的或國外的都將變成跛腳』。

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鞏固城鄉經濟結合之必要，鞏固經濟核算之必要，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要求最快地實行幣制的改革。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上說道：

『真正重要的，這是關於穩定盧布的問題。我們對這一問題從事工作，我們最優秀的力量在工作着，而且我們賦予這一任務以決定性的意義。我們在持續的期間內能够成功，而以後將永遠地把盧布穩定起來，這就是說我們贏了。那個時候一切這些天文學的數字——一切這些億、兆、京、垓都不足道。那個時候我們能够把自己的經濟置於穩固的基礎上，並在穩固的基礎上往前發展』。

在新經濟政策的最初幾年，蘇維埃國家財政金融政策的這一基本任務之解決，是倚靠商品流轉

之發達，預算赤字之消滅，確保貨幣穩定的通貨及商品必要基金之積累。必須克服破壞性的推論，這些推論是削弱爭取通貨穩定的意志，特別是所謂「發行經濟」的理論。此種理論遠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就已產生，但它的信徒們就在新條件之下也繼續擁護此種理論，這是違反黨的最迅速地創立穩固通貨的路綫。根據此種「理論」，認為價格與稅率如果定期地加以重新審查，相應地利用貨幣制度以籌措國家機關的經費，那末發行經濟將永遠地存在着。

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蘇維埃國家所處的經濟環境，不能立刻實行幣制的改革。預算還有巨大的赤字。一九二一年嚴重的農產歉收，瀰漫全國。當時商品流轉還不够發達，這是與農民經濟的自熱化、與國營及合作社對貿易工作習慣之缺乏及國家手裡商品之不足相關聯的。

從這裡就產生出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指出的經濟及財政金融政策的當前任務：用增長國營的、合作社的及私人的貿易，以及用提高農民經濟商品化的方法來增加商品的流轉；擴充對外貿易；減縮乃至完全消滅預算的赤字。

爲了與預算的赤字作鬥爭，必須：（一）縮減國家預算的支出，在預算支出方面實行最嚴格的節約制度，在一切經濟組織和機關中鞏固財政的紀律，調整整個預算經濟；（二）增加國營企業及國家財產的收入，其方法是鞏固經濟核算制，擴充商品及勞務的報酬制，提高勞動生產率，減低雜費的支出；（三）加強稅收，無偏向地實行從實物稅向貨幣的轉移；（四）發展信貸工作。

一切這些措施勢必減少，然後完全消滅利用發行作爲國庫收入源泉的必要性。

不管財政金融領域內的巨大的困難（此種困難在盧布猛烈貶值上表現出來），黨及蘇維埃政權堅決地否決了吸收外國資本來實行幣制改革的投降式的建議。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強調指出